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沙烏地阿拉伯新中等階級的興起

doi:10.30390/ISC.199402\_33(2).0005

問題與研究, 33(2), 1994

Wenti Yu Yanjiu, 33(2), 1994

作者/Author：林德昌

頁數/Page：56-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4/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402\\_33\(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402_33(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沙烏地阿拉伯新中等階級的興起

林 德 昌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一、前 言

儘管導致中東區域政治動盪不安的因素很多，如種族和宗教的緊張關係、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然而造成中東阿拉伯國家內部不穩定之原因，毫無疑問係源於快速的社會變遷。推動此一社會變遷的主要媒介，則是新中等階級（new middle class）的興起。新中等階級的出現，肇因於一些阿拉伯國家傳統君主的致力於現代化運動，以及早期外國殖民者在一些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與管理政策。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大量的石油收入已使沙烏地阿拉伯在社會和經濟上發生了重大轉變。於此一背景之下，新中等階級已漸成爲影響沙國社會變遷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即欲探討新中等階級的崛起，是否會對沙國未來政局的穩定造成威脅？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沙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石油蘊藏國與最大的原油輸出國，而且也因爲沙國未來發展必將影響及全球之能源問題。①爲回答上述問題，本文擬首先界定新中等階級的含義，並建構一個新中等階級的行爲發展模式；經由對此一模式的分析，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新中等階級對沙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

## 二、新中等階級的定義

就中東地區而言，新中等階級主要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團體，如宗教學者、政府公務人員、專業人士與教師等，渠等之共

註① John A. Shaw and David E. Long, *Saudi Arabian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Change on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2), pp. 4-8.

同特色為具有相當之教育程度。宗教學者團體為阿拉伯社會中一支最古老的社會團體，仍具有相當崇高的社會地位；至於其他世俗化團體之興起，則受惠於現代教育的發展與普及。

高斯基 (John H. Kautsky) 以典型的職業類別，來區分這些世俗化的受教育人士，如律師、醫生、教師、新聞從業人員、政府文官，以及軍官等等。<sup>②</sup>凱都瑞 (Elie Kedourie) 指出在殖民地社會中，這些人士被稱之為「邊緣人」(marginal men)，因為渠等徘徊於傳統社會與現代西方社會之間，而不屬於兩者之一。<sup>③</sup>因此，所謂的新中等階級人士，渠等之權力和影響力乃係源於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並學習了現代西方的科技與知識。易言之，現代世俗教育乃成爲新中等階級之獨特資產，亦是追求社會地位、個人所得與權力的基礎。

自社會學的觀點而言，階級的定義經常取決於下列三項因素：財富、社會地位和權力。<sup>④</sup>然而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階級的觀念主要係以權力和職業類別來定義。一般而言，新中等階級的成員，試圖憑藉本身之專業技術與才能而獲得擢升，財富與人際關係反居次要因素。綜觀伊斯蘭歷史，個人的權力地位與其專業技能有相當密切之關係。一個人倘能有效運用其所具有之技術與才能，即可發揮其權力和影響力，如軍官、教士和政府文官等。<sup>⑤</sup>

根據貝爾 (Gabriel Baer) 的研究，在許多受教育人士之間，如政府公務員，在一般阿拉伯社會中均廣受尊重。<sup>⑥</sup>伯格 (M. Berger) 的調查亦指出，在埃及的政府各部門中，公務人員擁有相當之威望。<sup>⑦</sup>公務人員之所以令人羨慕，主要是其不用從事體力勞動，且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阿拉伯人一般均鄙視需要付出體力勞動的工作，故對進入職業學校的興趣缺缺。

新中等階級大體上並非是一個爲其他社會階級所僱用的階級，因其維生之計並非需要依靠財產的擁有權，或是企業的經營，而係仰賴於薪資所得、學者獎學金，以及專業活動等等。雖然一些新中等階級仍具有僱員身份，然渠等乃是將勞力奉獻給政府機構組織，而非爲其他社會階級所僱用。要言之，新中等階級主要是白領階級，從事於技術、專業、文化和行政上的職務，如教師、公務員、教授、學生、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作家、藝術家、新聞從業人員，以及軍官等。

註② John H. Kautsky,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2), pp. 106~107.

註③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1970), pp. 80~81.

註④ James A. Bill and Carl Leide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 p. 111.

註⑤ *Ibid.*, p. 111.

註⑥ Gabriel Ba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Alton Shiloh, ed.,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 184.

註⑦ M. Berger, *Bureaucracy and Society in Modern Egyp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94~95.

### 三、新中等階級的行為發展模式

一般而言，新中等階級的興起，乃是對中東地區傳統政治社會制度的一項威脅。在土耳其、埃及、利比亞和突尼西亞，新中等階級業已掌握政權，並推行各項發展政策，且獲致相當程度的成果。在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新中等階級雖已掌握政權，但仍無法解決各階級和團體之間的傾軋與不和。由於這些紛爭的存在，已然嚴重阻礙了該等國家之政治發展與現代化。此外，在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及一些波斯灣國家，大多數的新中等階級仍被排除於政治領域之外。根據上述阿拉伯國家的發展經驗，新中等階級的行為發展模式，約可歸納如下各點：

1. 現代化運動的展開，以及隨之而來的快速社會變遷，均造成中東地區新中等階級的崛起；基本上，此一現代化是由各阿拉伯國家政府當局或外國殖民統治者所推動。由本國政府所推動的現代化，主要是一個傳統政體在面臨西方國家之軍事和文化威脅下，所採取的一種因應措施。中央政府爲了要募集人才、實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化，以及建立一支有素的現代化軍隊，乃招募一些具有傳統教育基礎之人士，去學習西方的知識與科技。因此，阿拉伯國家的傳統政府在無形中創造了一支新中等階級來爲其服務。

在獨立的中央政府建立後，政府的官僚體系開始迅速擴張。根據伊拉克前任財政部長達夫塔利 (Ali Muntaz ad-Daftari) 所言，政府各部門的人員名額，在獨立初期增加得相當快。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到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一點三倍，一九四四年一點五九倍，到一九四七年則增加了二點一八倍。<sup>⑧</sup>另根據埃及的公務人員委員會之調查，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四年之間，政府各部門人員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另外一項調查亦指出，在埃及總人口中，於政府部門工作的人員比例，高於英國；同時，政府支付官僚體系之經費在政府預算中所占的比例，亦多於英國。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間，此一經費支出在埃及政府預算中，已高達百分之四十六。<sup>⑨</sup>

隨著教育的普及，教師人員亦大量增加。例如，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三年，埃及教師人員約增加了兩倍；在一九四三年，已約有五萬名教師。一九五二年，教師數目再增至六萬四千名。至於伊拉克公立學校的教師數目，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約增加了十倍之多；一九五一年，再增加兩倍，達到了萬餘名；至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二萬四千餘名。<sup>⑩</sup>

⑧ Gabriel Baer, *op. cit.*, p. 185.

⑨ *Ibid.*, pp. 82-83.

⑩ R. D. Matthews and M. Akrawi, *Education in Arab Countries of the Near East*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49), pp. 37, 140.

此外，在中東地區新中等階級的形成，亦與外國殖民者的統治政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一個傳統的阿拉伯社會在外國之占領下，刺激了當地政府行政和經濟上的現代化，也對該國之傳統社會與文化結構，產生深遠的衝擊。由於外國的占領者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依賴本土人士的協助提供訊息、實行政策、維持秩序，以及合法化外國殖民者的地位，因此這些本土人士乃接受現代的科技知識與訓練，並得以充任在政府行政、司法或軍事各部門中的職位。

新中等階級最初係與外國占領者或殖民者站在同一陣線，支持現代化的發展，然而渠等最後勢將轉而反對外國統治者，因為前者開始質疑後者推動現代化的誠意。此外，在獨立運動成功之前，本土人士和外國人之間，亦經常因職務上的競爭而交惡。最後造成這批新中等階級民族主義之高漲。<sup>①</sup>同理，新中等階級於方興未艾之際，亦多與傳統政府相互依存。但在隨後的階段中，新中等階級與傳統政府的角色必將互換；此時的新中等階級儼然成爲鼓吹加速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角色，傳統政府轉而處於被動的地位。

2. 新中等階級的發展，已逐漸成爲對傳統政治社會制度的一項威脅。儘管新中等階級人數已大量增加，但傳統政府在吸收這些人才方面，則受到相當的限制，如受限於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低落，以及政府本身經費的短絀。因此在一些阿拉伯國家中，雖然由於現代教育的普及，培養了相當多的專業人才，但因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故新中等階級均對前途感到悲觀。在埃及的新中等階級，失業問題特別嚴重。<sup>②</sup>

此外，傳統社會結構的存在，亦普遍造成當時阿拉伯知識份子的挫折感。由於教育的普及與對外在世界的接觸與了解，已然使得新中等階級渴望提高其生活水準，並期望國家快速邁向現代化。然而，新中等階級亦體認到，由於其本身與其他民眾之間有思想上的鴻溝，遂造成雙方溝通的困難。更有甚者，新中等階級亦不滿現存的傳統社會和經濟結構，阻礙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因此，一些新中等階級人士，咸主張權力關係和權威結構的改變。大體而言，新中等階級強調以專業知識取代個人裙帶關係，以公平、公正的原則取代財富觀念；以知識上的自由取代強制性的壓迫，並主張以政治參與來破除政治上的壟斷。易言之，新中等階級在追求其社會和經濟地位時，皆冀望此一地位能帶來聲望和尊嚴，而非金錢上的報償。

綜上所述，只要現代化的過程順利，新中等階級仍將效忠於傳統政府。反之，倘現代化成效不彰，新中等階級必將轉變成爲一支革命的力量，致力於舊秩序的推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等階級和傳統君主之間的緊張關係，若欲維持相當時日之相安無事，亦是可能的。主因是新中等階級本身經常缺乏凝聚力，而無法成爲一支團結的革命力量。如同在中東地區的其他社會團體，新中等階級亦苦於內部之分裂。此一分裂因素，包含了種族、家族、宗教、職業、社會背景，以及地理（城

註① Gabriel Baer, *op. cit.*, p. 185.

註② D. Lerner and L. Pevs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1958), pp. 137~138.

市和農村)上的差異性。由於這些差異性的存在,影響及許多新中等階級人士對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的不同看法。但自歷史的經驗觀之,倘國家一旦面臨了嚴重的內外危機,則常導致不滿的新中等階級共同起而行動,如一九二三年的土耳其,以及一九五二年的埃及。在如此情況下,新中等階級傾向於背棄傳統政體,而效忠於一支矢志改變現狀的革命勢力。

3.自十九世紀以來,在中東的現代史中,爲了要推動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改革,軍官經常扮演著奪取政權的角色,如一八八一年的埃及、一九〇八年的土耳其、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以及一九五八年的伊拉克、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的敘利亞,與一九五二年的埃及等。由此可知,在多數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雖然軍人的角色並不太重要,但在阿拉伯國家軍人似乎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中東地區與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年輕的軍官都是主張西化運動和社會改革的先鋒。在多數的阿拉伯國家中,軍隊乃是第一支根據西方模式塑造而出的現代組織;軍隊遂成爲散播西方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媒介。傳統政治和社會秩序的諸多缺點,已難爲這些軍官所容忍。再者,於多數阿拉伯國家中,上層階級依然壟斷政權;倘一旦上層階級與社會發生對立情況,軍隊乃被委以恢復舊秩序之重責,如一九五二年一月,發生在埃及的黑色星期六(Black Saturday),以及一九四八年在敘利亞的十一月暴動等皆是。在如此的發展下,軍隊對上層統治階級必然逐漸失去信心。由於沒有其他的社會團體或階級,擁有足夠之力量來改變現狀,因此阿拉伯國家的軍隊自認其本身不但具有實現改革的力量,而且亦懷有強烈的使命感。<sup>⑬</sup>

在阿拉伯國家的軍官之間,亦有一些成爲一國之政治領袖,如埃及的納塞(Gamal Abdel Nasser)、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Gaddafi),以及敘利亞的阿塞德(Hafez al-Assad)。此等人士的竄起掌權,印證了新中等階級對本身的期望與抱負。然而,由於軍隊無法迅速建立一個廣泛的民主基礎,以保持社會均衡與進行改革;是以,這些軍隊經常被迫訴諸於軍事獨裁,而缺乏人民的普遍支持。

瑞夫(William A. Rugh)在其「沙烏地阿拉伯新中等階級的興起」(Emergenc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Saudi Arabia)一文中,探討了新中等階級在沙國的崛起背景。<sup>⑭</sup>沙國的新中等階級係由傳統王室所建立,當時的傳統君主不僅重視其在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統治基礎,而且也積極的促進沙國在經濟和基層建設上的發展。在沙國的一些美國石油公司,不但造就了一些新中等階級的興起,且亦提供了鉅額的石油收入,使沙國得以推行現代化建設。在推動現代化過程中,爲了要實行一些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必須要擴充政府的官僚體系;爲了要防衛國防安全,亟需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最後,爲了要培育現代化所需的人力資源,現代教育的發展已是刻不容緩。在這些背景之下,沙國新中等階級乃逐漸興起。

註⑬ Gabriel Baer, *op. cit.*, pp. 187-188.

註⑭ William A. Rugh, "Emergenc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Journal*, 27 Winter 1973, pp. 7-20.

## 四、沙國社會結構的轉變

在沙烏地阿拉伯，新中等階級的興起，已是一項不爭之事實。表一清楚的指出，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五年，新中等階級的數目已有大量的增加。在一九六五年，由公務人員、軍官和教師所組成的新中等階級，僅有一萬四千九百人，但在一九八五年，已增加至十一萬三千餘人。此一統計數字亦顯示，儘管此三個主要團體的新中等階級人數，在一九六五年只佔所有沙國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一，但在一九八〇年，此一比例已增加到百分之七點二，一九八五年更增加至百分之八點一。<sup>15</sup>

沙國公務人員的增加，主要係因現代教育發展的結果。自從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實施以來，經濟的成長已成為沙國的一個主要目標。爲了要完成經濟成長的目標，沙國亟需專業、管理與技術等各種人才，因此現代教育的發展已是刻不容緩。一九二六年，首座中等學校在沙國設立，並在學校課程中列入現代科目。但在一九三〇年代，沙國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仍是相當的緩慢。在一九四六年以後，由於石油收入的增加，促進了沙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沙國政府僱用了不少的埃及教師在沙國任教，並遣送不少學生赴埃及進修。一九四九年，阿美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著手一項五年計畫，以訓練並提昇其員工素質。於此一計畫之下，不少沙國員工被挑選送至貝魯特（Beirut）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或至美國本土進修。阿美石油公司且爲其在東部各省的員工子女，提供了現代教育的機會。<sup>16</sup>

一九五三年，紹德國王（King Saud, 1953—64）設立教育部。在紹德國王任內，各級學校學生的數目，已有三、四倍的增加。一九五七年，紹德國王成立了利雅德大學（Riyadh University），此爲沙國第一所世俗大學。一九六〇年，在各方的抗議下，女子教育亦已開始發展。爲加速沙國現代化之發展，費瑟國王（King Faysal）決定對全體國民提供基礎教育

表一：沙國新中等階級（1965~1985年）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公務員	3,600	6,000	18,100	40,700	56,800
（增加%）		67	202	125	40
軍官	5,600	6,000	7,000	7,400	11,100
（增加%）		7	17	6	50
教師	5,700	10,200	22,200	38,000	45,300
（增加%）		79	118	71	19
共計	14,900	22,200	47,300	86,200	113,200
（增加%）		49	113	82	31

資料來源：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tatistical Yearbook*, various years.

<sup>15</sup> J. S. Birks and C. A. Sinclair, *Arab Manpower* (London: Croom Helm, 1980), chapter 5.

<sup>16</sup> A. L. Mosley, *Power Play: The Tumultuous World of Middle East Oil, 1890~1973* (New York: Praeger, 1973), p. 327.

，並加強中等、高等教育，以及職業學校的設立與發展。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由於石油收入激增，沙國現代教育制度亦因之迅速擴展。此外，法德國王（King Fahd）推動教育發展更是不遺餘力。在一九八九年，在沙國學校就學的學生總數，已增加至二百六十五萬人，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一百一十六萬為女學生。<sup>17</sup>另根據沙國第五個五年計畫（一九九〇—一九九五）的預測，未來教育制度仍將繼續擴展。

至於軍官人數的增加，乃緣於沙國政府相信，爲了要確保油源，組織與訓練一支有效的現代化軍隊，有其必要性。一九六〇年代中葉，沙國推行一連串的重要軍事現代化方案。爲建立一支獨立的現代化軍隊，派遣許多年輕軍官至西方學習，渠等乃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部族軍官。一九六五年，只有五千六百餘名軍官；然而，這些軍官的數目在一九八五年，增加至一萬一千餘名。至於沙國軍隊的員額，在一九八二年，估計有五萬二千餘人。<sup>18</sup>一九八七年，軍隊人員編制已擴展至約六萬三千五百餘人。<sup>19</sup>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作爲沙國社會的一支重要潛在力量，新中等階級的興起已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在一九六〇年代，第一代接受現代教育的沙國人士，已漸晉升到具有影響力的地位，如當時的石油部長雅曼尼（Zake Yamani）即是一例。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已逐漸嶄露頭角的其他技術官僚，包括當時的財政部長卡伊（Mohammed Aba al-Khayl）與工業部長戈西比（Ghazi al-Goasibi）。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副部長級的職位也開始由具有美國博士學位的年輕技術官僚團體所擔任。

儘管在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在數目上具有相當優勢，而新中等階級之人數在今日仍是相對的少數，但此一情況不太可能長期延續下去。展望未來，由於市場的供需情況，將更有利沙國新中等階級的興起。個人所得的增加、教育機會的普及，以及政府津貼補助的放寬，接受教育之人士必然大爲增加。再者，由於高工資政策，生產將會是以資金集中爲主，故對各種經理和專業人才的強烈需求，將會成爲未來之發展趨勢。當沙國人士學習了必要的技術和教育訓練，渠等乃逐漸取代了原有的外國技工。此一過程，亦將造成新中等階級人數上的增加。

此外，尚有一個重要因素，可解釋何以沙國的社會結構在未來將面臨轉變。在沙烏地阿拉伯，商業團體主要是由一些相當小的公司企業組成。在一九七六年，中型和大型的公司企業，在非農業企業中僅占百分之五弱。由於沙國生產部門並未全然發展，以及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所扮演的獨占性角色，私人企業的成長受限，乃是意料中事。未來亦無跡象顯示財經資源會

<sup>17</sup> Saudi Arabi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Royal Embassy of Saudi Arabia, Information Office (Washington, D.C.: 1989).

<sup>18</sup> Summer Scott Huyette, *Political Adaptation in Saudi Arabia: A Study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117.

<sup>19</sup> EIU Country Profile, *Saudi Arabia*, 1989~90, p. 6.



由政府轉移到私人部門，因此沙國的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不太可能發展成爲一支重要的社會團體。於此一發展趨勢下，沙國新中等階級將有更大的機會，形成重要的一支社會力量。

## 五、傳統政治體系面臨威脅

沙國採行封閉性的政治體系，王室對於各種政治上的動亂與顛覆活動，均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易言之，無法容許在政治上反對王室。再者，沙國王室不允許政黨存在，與王室政策不合之言論，亦遭禁止與取締。任何示威行動與集會，均會被課以重刑罰。很顯然地，沙國政府並不允許社會上表達任何不滿的意見與政治活動。<sup>20</sup>

沙國的專制王朝，主要權力來自部長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其中多數成員多屬於王室家族，這些部長官員皆對國王負責。國王只要在卅天內採取行動，即能否決部長會議所作的任何決議。伊斯蘭法典 (Sharia) 是沙國立法的依據。然而，由於沙國社會的快速變遷，有些立法亦經由王室諭令頒布之。原則上，法官係超脫於行政權力之上，恪遵伊斯蘭法典，但國王仍有最後懲罰或赦免的權力。

沙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內部問題在於王室本身。阿濟茲 (Abdel-Aziz bin Abdel-Rahman al-Saud) 在一九二四年統一了沙國領土，使沙烏地阿拉伯成爲一個政治上的實體。當他在一九五三年逝世時，遺留下四十二位兒子。迄至今日，紹德王家家族在沙國的政經發展上，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目前沙國王室約有二、三百名親王，儼然成爲一支重要的政治團體，並運用行政權力控制了全國事務。這些親王散佈於全國的不同組織機構內；資深的親王獨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資淺的親王，則擁有高級政府文官之職位，以及一些半官方的組織機構、軍隊，和大型的私人企業。

根據以上之分析，吾人可了解何以新中等階級會對沙國政治情勢感到不滿。事實上，在新中等階級與沙國王室家族之間，已有衝突之事例。沙國王室的決策，乃爲高度的個人化，如同其他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傳統特色。一個人若欲躋身高位，則不但其出身背景、階級和年齡重要，而且與政府決策者的良好人際關係亦扮演重要因素。但對新中等階級而言，渠等強調個人才能的重要性，反對世代相傳的家族觀念。

此外，沙國王位繼承制度的無法確立，已導致王室家族經常處於激烈的爭議之中。這些王室內部的爭議，若牽涉到王室以外的決議或政策時，有些王室家族成員乃轉而尋求新中等階級的支持，並承諾以憲法或社會經濟上的改革。例如，阿濟茲

<sup>20</sup> William B. Quant, *Saudi Arabia in the 1980s: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and Oil*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81), p. 92.

國王死後，王位由其子紹德繼承。紹德國王繼位之初，因健康欠佳，故其權力已不如其父。當時沙國亦面臨多事之秋，首先是埃及納塞所號召的泛阿拉伯主義，以及沙國內部所面對的石油財富、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由於紹德國王之權力基礎不穩固，故轉而尋求新中等階級的支持。<sup>①</sup>這些新中等階級所要求的是憲政改革，以及快速的經濟發展。因此在紹德國王任內，加速了現代化的工作。

在過去幾十年來，一些證據顯示在軍隊和政府官僚體系中，已有一些新中等階級表達了不滿的情緒。第一個著名的例子係發生於一九五五年，由一群軍官所發動的顛覆活動。當時沙國有一支所謂「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團體，仿照當時埃及之政變模式，主張建立憲政王朝，但遭沙國政府查獲與鎮壓。<sup>②</sup>在軍隊中最嚴重的動亂，則發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和九月的政變；此一政變的結果，造成相當多軍人和政府文官被逮捕。

在沙國軍隊中，缺乏晉升的管道乃是軍人產生挫折感之主因。儘管一些軍官曾獲多次擢升，但實際上其職位仍與多年前大同小異。同時，王室家族人員多半占據軍事高階職位。至於國家防衛隊(National Guard)，也為沙國王室製造了一些難題。此防衛隊雖配備以現代科技，但其成員招募是以貝都因部落(Bedouin Tribes)為主。由於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環境的改善，貝都因游牧民族雖仍忠於王室，但國家防衛隊內部開始出現了分歧意見。例如，在一九七九年底和一九八〇年初之間，國家防衛隊曾奉命前往東部省份鎮壓什葉派暴動，但在占領麥加(Mecca)的清真寺時，一些防衛隊成員曾表現出反叛行為。

在政府官僚體系中，新中等階級的秘密政治活動和宣傳，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最著名之例子為沙烏地解放陣線(Saudi Liberation Front)與阿拉伯半島人民團結組織(Un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新中等階級對沙國王室所構成的威脅，亦可由基本法(Basic Law)問題的討論中窺其端倪。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每當沙國面對國內外或繼承危機時，統治者皆因面臨威脅而企求新中等階級之支持。統治者多承諾以起草基本法，界定公民之權利與義務，並擴大政治參與。這些事例曾發生於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紹德親王和法德親王之間的爭鬥)，以及一九六二年(內部動亂與葉門戰爭)。

由於一九六九年一場政變的結果，費瑟國王曾承諾於一九七〇年初，設立全國諮議會(National Consultative Assembly)，但無疾而終。一九七五年，因費瑟國王遭暗殺，哈立德國王(King Khalid)乃宣佈成立全國諮議會，試圖囊括一些年輕的部落領袖和新中等階級人士，但最後亦未設立。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法德親王(Crown Prince Fahd)宣佈政府

註① Monted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29.

註② 這些年青的軍官或親王，具有自由思想，在當時電信部長塔拉親王(Prince Talal)的領導下，主張建立沙國為一憲政王朝，並加速現代化的推動。

將頒佈基本法，建立一個由王室和內閣共議的中央政府，並重組地方政府。一九八二年三月，法德再度指出於未來數月內，其所承諾的起草基本法，將付諸實行。<sup>②</sup>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法德再度宣稱擬議中的全國諮議會，將於次年初正式運作。然而在一九八五年四月，法德再向沙國人民保證，全國諮議會將儘速實施。其後，因兩伊戰事的影響，沙國王室對政治改革的各種承諾，均告緩議。

一九九一年二月，四十三位新中等階級人士，聯名致函法德國王，要求在全國及地方建立諮議會。當時因適逢波斯灣戰爭，沙國王室正面臨內外威脅，而亟需新中等階級的支持，故為順應民情，乃放寬了對新聞言論尺度的限制。然而在波斯灣戰爭結束後，沙國王室所面臨的外在威脅已告解除，乃轉而尋求保守份子的合作，以新中等階級為犧牲。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法德國王在一場對宗教領袖的演說中，指出沙國仍應恪守伊斯蘭法典，致使新中等階級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全告落空。<sup>③</sup>在沙國之政治發展上，此已儼然成爲一種模式。沙國王室在面臨內外危機或威脅時，即對新中等階級承諾以政治改革；一旦危機解除，此些承諾亦均告無疾而終。

## 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

沙國的經濟結構，乃係由石油收入所塑造。儘管龐大的油元已使沙國成爲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其也爲沙國帶來了政治和經濟上的緊張情勢。新中等階級在此一特殊經濟結構之下，將扮演何種角色？其對政治和經濟將造成何種影響？殊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

1. 國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獨占性角色。由於石油生產與出口之盈餘均歸之於政府，因此政府部門壟斷了沙國的資源，儘管沙國仍懷有自由企業的意識形態。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〇年之間，政府部門在對內經濟投資方面，兩倍於私人企業。由於沙國石油收入是相當的龐大，因此一位貪污腐敗的部長官員，抑或一位政府決策者的錯誤估算，皆可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之影響，而損及人民的社會福利。沙國第二個五年計畫（一九七五—一九八〇）所列出的錯誤預算，即是一例。根據是項五年計畫，百分之六十四的政府經費，計畫用之於建設發展項目，如基層建設、經濟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社會資源；百分之卅六的經費則分配爲國防、外援、各項補助與行政體系使用。然而，在該五年計畫末期，由於國防和基層建設經費激增，致實際上的支出比最初所列之預算高出了約百分之四十。儘管在國防上的實際開支，較最初所計畫多出三倍，但原列爲開

<sup>②</sup> Mordechai Abir, *op. cit.*, p. 91.

<sup>③</sup> *Ibid.*, p. 188.

發經濟資源之經費，則縮減了一半。<sup>⑤</sup>

另外一個例子，亦與國防經費有關。在一九八〇年，沙國的個人平均國防費用，每年約二千五百美元，比美國多出四倍，亦高於同年的以色列。<sup>⑥</sup>由於沙國只擁有一支小型軍隊，因此只有少數的沙國人民能因軍事開銷而直接獲利。再者，耗費於國防上的龐大費用，亦可能引起人民之不滿，因為一般沙國人民會認為沙國鉅額之國防軍事支出，並非用之以捍衛國家安全，而僅爲了保護少數統治階級的福祉。

2. 財富分配。在沙烏地阿拉伯，城市和農村人口在收入方面有鉅大差異，城市化的進展可能導致沙國內政上的動盪不安。此外，居住在城市地區的中等收入團體，多屬於政府公務員，以及一些小、中型公司企業負責人。然而，這些團體皆經歷了相對收入之減少。例如，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〇年，政府公務人員的薪資，不但不如生產工人的收入，亦無法與從事其他非石油國內生產工人相比較。

政府公務人員加薪幅度的緩慢，指出了在城市地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團體之間，薪資差距的縮短。此一事實，可能使受教育的勞工產生挫折感，因而理想破滅。既然政府當局爲這些新中等階級的主要僱主，故後者必然將其不幸之遭遇怪罪於政府。再者，倘政府公務員認爲政府是貪污腐敗的，則其對國家的不滿將更增加。以沙國爲例，此一問題將較其他國家更爲嚴重，因爲沙國擁有數目龐大的王室家族。

3. 財富來源。沙國的政府預算，主要仰賴石油收入。由於宗教和政治上的因素，沙國政府不能也不願意對人民課稅。是故，沙國的財政收入幾全依賴石油出口，而此乃受全球石油市場的供需狀況之影響。由於全球石油需求量的減少，以及新石油生產國產量的增加，在一九七九年以後，石油價格下滑，沙國石油銷售市場亦告衰微。一九八三年一月，沙國石油產量，從一九八〇年的一天超過一千萬桶，降至一天四百萬桶。一九八三年三月，根據每桶廿九美元的石油官價，沙國賺取了五百卅億美元的年度石油收入，但對於第三個五年計畫（一九八〇—一九八五）的實行，卻短缺了七百卅億美元。<sup>⑦</sup>在此一情況下，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沙國政府被迫使用外匯存底，以彌補石油收入之不足。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沙國也提高了進口稅，試圖增加非石油收入的來源，然而其他方案，諸如徵稅，則因遭致反對而胎死腹中。

沙國財政緊縮，不僅王室聲譽受影響，而且也會造成王室和中等階級之間的相互責難。因爲沙國人民相信上帝提供財富給富裕者，因此這些富裕人士有責任去照顧貧窮者的需要；對阿拉伯人而言，這不是一種慷慨的行爲，而應是一種責任。

<sup>⑤⑥⑦</sup> Saad Eddin Ibrahim,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A Study of the Social Impact of Oil Wealt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p. 111.

<sup>⑧⑨</sup> A. Reza S. Islami and Rostam Mehraban Kavouss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audi Arab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p. 51.

<sup>⑩</sup> EIU Country Profile, *Saudi Arabia, 1989-90*, p. 29.

反之，貧窮者亦有權利要求富裕者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如果沙國因財政不佳而中止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則可能引發一場政治上的衝突。

## 七、結 論

新中等階級的興起，在中東地區已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大體而言，這些新中等階級主張國家的現代化、政治參與，以及經濟公平與公正。在土耳其、埃及、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等國家，新中等階級已成功的掌握政權，並推動各項發展政策。至於一些傳統保守的阿拉伯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和波斯灣國家，亦因國內新中等階級力量的成長與茁壯，而逐漸面臨許多改革上的壓力。

就沙烏地阿拉伯而言，新中等階級在近幾十年來的發展，已然改變了沙國的傳統社會結構，並成爲一支重要的潛在社會力量。此外，在阿拉伯的獨特文化背景下，由於勞工階級受鄙視，以及資產階級發展空間的受限，新中等階級在沙國的未來發展，已成爲一股難以遏阻的潮流。就政治方面而言，沙國王室已無法全然忽視新中等階級的政治改革要求，此可由其所承諾的一些改革中看出。惟沙國所面臨的內外危機一旦消失，則對政治改革上的承諾亦告無疾而終。此不但成爲近幾十年來，沙國的政治發展模式，並爲沙國未來的政局穩定種下了擾攘之因素。最後，就沙國經濟發展層面而言，石油市場供需情況的不穩定，以及政府所列預算的不平衡，將不利於沙國的經濟發展，並影響及新中等階級的生活需要與期望。一旦新中等階級對本身之處境不滿，勢將對沙國王室提出更多之要求。凡此種種，都將影響沙國未來的政局發展。